

导 论

江户时代(1603—1867 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末期,是 1868 年明治维新的前夜,因首都为江户(今东京)而有此称,又因是德川家族的统治,也称德川时代。在这 265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封建社会达到顶峰并迅速走向衰落。从政治上看,朱子学与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成为官学,完成了政治与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也把这种情况推向极端;从经济上看,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出现,后者又取代了前者;从文化上看,封建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歌舞伎、绘画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这种封建文化也难免被市民文化所取代。总之,江户时代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儒学作为德川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发展,原因不仅在明治时代,不单纯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即江户时代,已为日本步入近代社会准备了条件。海内外学者对日本的研究,只注意到了明治以来的日本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了欧美列强,忽视了对前近代化时期的研究,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忽视了近代日本社会的进步与变革的历史动因。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

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ethos）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而江户时代儒学的发展，正是日本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影响了这一时代的学问、学术，而且在实践层次上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对武士、町人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影响尤为深远。前者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政治力量，后者则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代表。因此，不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就不能理解儒学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更难于把握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能理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进步。同时，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研究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问题，将为今天研究儒家文化与东亚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那么，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呢？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历史和文化因素呢？

首先，从经济上看，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成熟期，进而过渡到由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特别是町人阶层的崛起，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是 18 世纪日本社会由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标志。当时，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的长治久安，客观上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 17 世纪中期 即宽文、延宝年间（1661—1680 年）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开始出现变化。德川家族执掌幕府，社会进入长治久安的时代，农村由“兵农不分”变成了“兵农分离”，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农民中又分裂出了手工业者，社会阶层渐次分化。由武士、农民组成的当时日本社会渐渐分化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幕藩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原来是

把军事作为第一目的，由于军事紧张方面的缓和，加之各藩财政上的空乏、武士生活的贫困化，藩主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方面，在政策上制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出现了城市和农村经济共同繁荣的局面，商品经济逐步向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幕府和诸藩都在奖励农民勤恳务农的同时，积极指导改良生产技术，奖励开垦新田，耕地比丰臣秀吉时代增加了近两倍。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书籍也就在此时出现，如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

当然，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 即城下町的繁荣。“由于实行兵农分离 武士离开了土地 成为居住在城市四周的纯粹消费者。再加上城市的位置，从往昔的偏僻地方移到了水陆交通的要冲，这就不能不带来城下町的兴旺。其中江户城为天下之首，除将军直属的家臣之外，全国的大名也都率领家臣在这里居住并参觐。庆长年间，江户城全城约有三百条街，到正德年间增加到 933条。人口数虽不详，但估计最盛时要超过百万。17世纪后半叶到 19世纪初，江户城的人口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城市。此外象金泽、鹿儿岛、仙台、名古屋等十万石以上的城下町 在全国约有 50座 这些都是地方上屈指可数的城市 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繁荣。除城下町以外，千年皇都的京都、国内物资集散地的大阪也都拥有几十万人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发展的一个方面”。^① 我们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上看，封建社会已渐趋衰落，必然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当然，自然经济是江户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要求打破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政治，摆脱政治束缚，自由发展商品经济，由以农为本，到农、商并重 逐步改变经济价值观。

书目 104 第 296 页。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幕府体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幕藩体制主要是建立在对大批自耕农、租佃农的剥削基础上的。幕府和各藩通过控制自耕农和租佃农，把农民禁锢在小规模的园艺式的农业中，以广泛的小农劳动的巨大浪费为代价，来支撑幕府的统治。所以，幕府十分重视小农经济的稳定和防止农民的破产，并在行政措施和法律上严格限制。1642年幕府先后五次公布了《乡村诸法令》，1643年制定了《土地管制条例》17条、《代官服务条例》、《乡村告示》等法规，主要内容不过是两点：一是禁止永久出卖田地；二是禁止农民迁徙^①。1673年德川幕府又发布了《分家限制令》，明文规定禁止拥有二町（20石）以下土地的村吏和一町（10石）土地以下的农民分家分地，以便更好地保持乡村的稳定、农业的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制度和法律之下，农民的境况有所改善并相对稳定，农业作为当时的立国之本，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江户时代的农民，对劳动的兴趣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很高。这主要表现在江户幕府和各藩都十分重视治水，认识到水利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这方面的成就，直到今天，也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在支撑着江户市市民生活的各个建设项目中，最大的是神田、玉川、千川三条河的引水工程。承应三年（1654年）玉川引水工程完成，最后的千川引水工程也于元禄年间（1688—1704年）投入使用。由于这三项引水工程的完成，维持了幕末一百二十万人的生活”^②。水利工程的发展，大片沼泽地变为良田，耕地面积有了明显的增加，耕作技术也日趋精细。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介绍农业技术的书籍，也在此时出现，如比较有名的是《才藏记》、《百姓传记》、《耕稼春秋》和《农业

书目 52 第 92 页。

书目 43 第 96—97 页。

全书》等等。这些农书在全国各地的出现，既是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的总结，又与近代农业的出现具有连续性，“成为近代农业技术的继承对象，农书也由近世农书变成了明治农书”。^①

与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商品的生产 and 城市经济也发展起来，特别是作为商业者阶层的代表者——下级武士和町人的发展及其身份的确立和巩固，为日本步入近代社会准备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其在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封建社会对农业的自然偏重，在德川时代造成了奇怪的矛盾现象。政治首领重视农业 就对农业课以重税 轻视商业 就课以轻的的间接税。这种状况，加上全国经济的统一，促使了一个富有的城市商人阶级的成长”^②。这个商人阶层就是由下级武士和町人组成的，其中町人在江户时代的经济地位尤其重要。而农民也不单局限在自然经济之中，也试图由农业转向商业。“德川时代国民经济发展时，居住在日本比较先进的中部地区的农民，纷纷由种植粮作物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比较富有的农民发现，把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自己集中精力搞食品、蚕丝和其它农产品加工，往往更为有利。18 世纪末，这类经营企业之风在日本农村真正地到了爆发的程度。较贫困的农民日益习惯于在富有的邻居或附近城镇的企业中赚工资贴补收入。因此，日本的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就远远地超过了封建社会的一般水平”^③。这样，下级武士、町人、部分农民都加入到商品经济发展的行列之中。

町人作为日本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工业者 早在镰仓时代，在京都、镰仓等地就有自己居住的店铺。战国时期 京都等地有“町众”是商工业者的上层。到安土桃山时期 也就是说在江户时代之

书 目 98 第 20 页。

书 目 33 第 72 页、73 页。

书 目 33 第 72 页、73 页。

前已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自兵农分离、武士集中居住在城下，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在门前町、城下町、港町等地方，商工业者增加。江户时代，江户、大阪、京都，史称三都，和各地形成商品流通网。町人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的身份规定里确定了自己的地位。町人分为家持或地主和店借、地借，前者有房屋，能参与町政，后者无权参与町政。町人中又有“问屋”（即批发商）、株仲間（同业组织）等出现。町人“从农民中间产生，这样一来，不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人、物之间有了大量的流动，而且也开辟了町人历史的新时代”^①。

在町人中间产生了“御用达”和“豪商”。御用达是指出入幕府和各藩为领主服务的特权商人，也称御用商人，也指其他为领主办置日常必需品、奢侈品的特定商人。他们经手幕府和各藩的贡租、专卖品的投标、买卖，充当金融掮客，聚集了大量财富。幕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也向他的赋课御用金。豪商即指富商，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在全国统一过程中与战国大名或统一政权相结合，经营船运业和仓库业而积累财富的所谓初期豪商；另一种是中期以后的豪商，他们经营钱庄和大米、木材的买卖，以及驳船运输等，并结交幕府和诸藩而成为大商人。江户后期，町人已不满足于既得的经济利益，而谋求把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并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江户时代商业和产业发展，不断冲击封建制度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渐打破了幕府经济发展的束缚。“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流通经济、由土地经济向货币经济大幅度的发展进步。原来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所以随着土地制度和税收的整顿，开垦、劝农等政策的实行，农业不断发展。与此相适应，林业、水产业、矿山工业等自然产业，纺织、造纸、酿造、制油、制腊、铸造铜器、漆器制造等

加工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客观上已经为社会的发展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力量。

其次，从政治上看，由德川家族建立的德川幕府统治，并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古城京都迁往江户（今东京）故也称江户时代。其缔造者德川家康，继承了在他之前的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所奠定的统一霸业，即被历史上所称道的“织丰政权”。织田、丰臣二人只能“在马上得天下，而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特别是丰臣秀吉政治野心很大，但在侵略朝鲜中败北，天下归于德川家族。

德川家康（1542—1616年）最初不过是丰臣秀吉政权下的大名而已，后来苦心经营、不断发展，以三河、远江、骏河三国为基地，积聚力量，势力迅速地扩大到甲斐、信浓，成为拥有五国领地的大名。1603年（阴）2月12日，后阳成天皇发布敕令，任命德川家康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家康与其子德川秀忠在有利的条件下，大力施展政治抱负，战胜了丰臣家族，也使日本的政治权力转移到江户，摆脱了京都盘根错节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束缚、牵扯。德川家康可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儒士武将。

他为了强化封建政治统治，实行幕府体制，这是江户幕府控制大名和统治广大民众的封建统治体系。幕藩体制实际上就是模拟中国的封建制，以大名作为幕府的藩屏，通过藩制，把260多个大名置于将军的绝对领导之下。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武士的戒规等手段，使全国上下都屈服于德川幕府的强权统治，也使得江户时代265年长治久安。这种体制萌芽于战国时代。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通过建设城下町、乐市、乐座制、太阁检地、没收武器等兵农、

兵商分离政策而逐步形成。德川家康集战国以来诸国大名的统治经验之大成，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以幕府为核心、诸藩为支柱的统治体制，把幕政与藩政结合起来。它的特点是：各藩既有分权的自治性，又必须受到幕府的强力统治。同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相比，江户幕府更具有集权性、更稳固、更持久。

德川幕府还吸取了过去的武家政治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严格限制天皇的权力，幕府将军名义上臣服天皇，但天皇对政事一律无权过问。1615年也就是在德川家康死去的前一年，幕府公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7条^①，详细地规定了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这样具体地用法律的形式限制，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直到幕府末期出现了“攘夷倒幕、大政奉还”天皇的情况，明治天皇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要求，开始了明治维新时代。

德川家族的15代将军采取将军世袭制，树立权威，把镰仓、室町以来的武家政治发挥到了极致。诸大名在将军的统治之下，一般的庶民阶层在大名的统治之下，对内专制，对外锁国。武士作为将军、大名的家臣分属于幕府和诸藩。武士立于庶民之上，作为统治阶级，享有特殊的权力，如带剑佩刀、使用名字等。社会保证武士阶级的权威地位，士、农、工、商四民，武士为首。这种体制是武家政治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身分制度，不仅限于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到家族制度。父子、夫妇、兄弟等的家族共同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形式^②。在江户时代，家也是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单位。长子继承制、职业世袭制，子从父、妻从夫，在家族中树立家长制的绝对权威。这和中国的封建社会一个模式，家、国一体，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国、家不分。这种家族制度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秩序的稳固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书目 55 第 4 卷 第 178—179 页。

书目 107 第 19 页。

构成江户时代社会政治的核心是幕藩体制，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近 700 年的武家政治。镰仓时代是武家政治发展的初期，室町时代为中期，江户时代则为后期。而作为后期的江户幕府，封建的国家体制、政治组织已相当完备，封建势力相当强大。因此，幕府政治和武家政治是同义语，是日本封建时代的军事独裁政治形态，统治者为“征夷大将军”。在整个幕府统治时期，朝廷的统治大权全归幕府，江户时代尤甚，天皇形同虚设，甚至限制天皇。

幕府政治建立了将军、大名、武士这样的主从关系，通过分封土地、权力，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在幕府政治发展的初期、中期，由于受地方分权的限制，在中央集权下也难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从镰仓时代开始，一直到江户幕府之前的几百年间，诸藩割据，武家争斗，战乱不堪，不能很好地发挥封建国家的特色和长处。

江户幕府总结了武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镰仓、室町两幕府的根本的政治方针，强调中央集权的统治政策，但在幕府权力的性质、政治组织的内容与以前两幕府不同。在江户时代，将军作为武士阶层的首长成为全国统一的中心，具有君临士民的绝对权威，并用相应的官僚体制和法令（如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诸法度等）支配大名，严格限制诸大名的权力，统治人民、分配土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户幕府成了武家政治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政权。

在江户时代前期，是属于幕藩体制成立和发展的时代（1603—1716 年），后期（1716—1867 年）是幕藩体制成熟、停滞的时期。随着日本封建社会的日趋成熟，在其内部，为了改变经济上的困境，幕府财政上的困难，加强政治统治，从 1716 年开始，连续进行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天保改革，试图改革幕府末期封建社会发展的命

运。但是 停滞容易发展难 中央集权政治所带来的的弊端 越来越明显，封建制度的危机在封建制度成熟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出来。集权有利于稳定，但不利于社会发展。

江户时代作为日本社会发展的前近代化时期，其政治发展过程、政治运行机构 在末期的效用、功能越来越低 不能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发展和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

第三，从思想上看，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大一统局面与之相适应。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受到了德川幕府的赏识与推崇 以至于“独尊”成为“官学”。朱子学家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都受到了幕府的重用，在思想领域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江户时代，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随着儒教的普及，并与庶民教育结合起来，成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儒家的五伦思想、等级身份制、价值观念，逐渐被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追求。

一方面，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如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江藤树、吉田松阴、会泽正志斋等人，努力钻研儒家学问，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理解和把握儒家经典，著书立说，教育后学，形成了在朱子学派之外的古学派、阳明学派、水户学派，在理论层次上做出了较为突出的努力 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另一方面 在实践的层次上，儒学又被武士、町人及整个社会下层所接受，特别是为新兴社会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上的武器。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受了朝鲜儒学发展的影响，换句话说，是通过朝鲜这个中介学习和发展了儒学。朱子学产生于中国的宋代，虽然也受到推崇，但还没有达到成为国教的地步。而在李氏朝鲜的五百余年历史中，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大力吸收中国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特别是把朱子学作为国教，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朝时代的大思想家，当推李退溪（1501—

1507年，他是李氏朝鲜前期的最伟大的学者，是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中国的儒学先传入朝鲜，然后经朝鲜传达到日本。李退溪是中、朝、日三国儒学交流史上的中介人物。他的思想对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暗斋等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大力吸收儒学，是从朝鲜传去的儒学。朱子学在李氏朝鲜成为国教。日本亦紧步其后尘，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官学、官方意识形态。这样，朱子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朝鲜、日本相近，而与中国朱子学的命运不同。朱子所注的四书，只是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朝鲜、日本的朱子学获此殊荣，李退溪的功绩是巨大的。他摒弃了宋学中的烦琐的、思辩的方面，强调以敬为中心的实践主义性质和特点，并影响了近世以来的日本儒学的发展，奠定了他在东方文化史上的独特的地位。

1592年的文禄、1597年的庆长之役，在这两次对朝鲜的侵略中，日本获得了意外的收获，从朝鲜人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汉学典籍，特别是在俘虏中有一儒师——姜沆，作为“向日本人传播儒教的朝鲜人”，他在日本滞留期间有机会与日本近世儒学的开山之祖藤原惺窝接触，后来惺窝写有《问姜沆》一文，并从师于姜沆学习儒学。惺窝因此弃佛而改宗儒学。在藤原的门下，出现了优秀的弟子林罗山，他受老师的影响，推崇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他作为德川家康的老师，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朱子学成为“官学”。他非常尊崇李退溪，最早传入日本的李退溪的书《天命图说》就是由林罗山写的跋，在朝鲜国使来访时，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承认李退溪才华的伟大，把退溪的思想当作重要的话题。《天命图说》在朝鲜刊行于1554年，97年后即1651年就在日本出现“和刻本”。从此时开始，李退溪的著作在日本连续刊行出版，盛况空前。《自省录》1665年刊行，《朱子书节要》1671年刊行，《朱子行状》1665年刊行，《易学

启蒙传疑》1669 年刊行、《圣学十图》1655 年刊行、《西铭考证讲义》1667 年刊行、《七先生赞》1669 年刊、《李退溪书抄》1811 年刊行，还有李退溪付跋的《延平答问》、《心经附注》两种 加上前列李退溪著书 9 种 共计有 11 种之多。并且，大部分书都刊行于 17 世纪中期，即江户时代前期。可见李退溪的著作、思想在日本影响之大。

就思想影响上看，是从藤原惺窝、林罗山到山崎暗斋及其门人佐藤直方，还有大家退野及弟子横井小楠、元田永孚。

藤原惺窝(1561—1619 年)从小就入佛门 成了京都相国寺的禅僧，1600 年，也就是在德川家康开江户幕府之前，他脱下僧衣换上儒服，出佛入儒，成为日本近世儒学的一代宗师。他的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与朝鲜学者的交往，对朝鲜汉籍图书的阅读。即在 30 岁时，他和李氏朝鲜使节团的书记官许(1548—1612 年)交往 读了许写的诗、文章 被许的儒者风采、学问所感动。后来他又认识了在庆、长之役被捕的朝鲜儒学者姜沆，结为至交，从姜沆那里学习了朱子学。这些在《惺窝文集》中均有记载。藤原的学问和经历，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世纪以来，也就是从封建社会初期开始的，以神佛为本位的世界观，重新认识现实社会的秩序，由依赖神佛保佑转向相信人的力量，把人从神佛的怀抱中解放出来，迈出了重视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的关键一步，实现了思想发展上的历史性的、关键性的转变 有着近似“文艺复兴”一样的重大意义。而他作为“文艺复兴式”的先驱者 把教育、思想从宗教中脱离出来，提倡宋学，特别是朱子学，思考新儒学中的宇宙人生一以贯之的人类存在方法，日本儒教也就成了伦理道德之教，这种思想的形成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与李氏朝鲜的儒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林罗山(1583—1657 年)是藤原惺窝门下最优秀的学生。他所读的书有 440 余部 包括日文、朝文、中文的书 内容主要是宋、元、

明时代的儒家之书 并经朝鲜学者审定的 如《学通辩》、《异端辩证》、《困知记》、《性理字义》等 推崇朱子 排斥佛学、陆王之学。这是因为受李氏朝鲜的影响，李朝是朱子学统治之国，是排斥异端之书的。他作为德川幕府将军的侍讲，这种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其有机会推行他的思想，并从根本上影响德川将军及上层贵族社会。他把中国、朝鲜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儒教文化大力介绍到日本，这些功绩对江户时代形成以儒教文化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作用是巨大的，成了由佛教文化转向儒教文化的中介人物。他提倡独尊朱子学，并不仅仅影响朱子学者，而且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包括日本的历史学、神道学、国文学、本草学等日本文化的范围内 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最尊崇李退溪的是日本朱子学中的保守主义一派，即以山崎暗斋（1618—1682年）为代表的海南朱子学派。山崎倾倒于朱子学门下，判断学问的标准唯有朱子学，在朱子学之外没有什么学问可言 在理论上完全肯定朱子学。并且在实践上偏重于“持敬”这方面 注重个人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的磨炼。他认为“敬者，一切心之主宰 而万事之根本也”，“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夹持 出入无悖”朱子学的穷理和居敬两个方面 穷理为向外发展 而居敬则归于内心精神世界，他选择了后者，并把它推向极端，只追求个体内心的道德修养，注重修养的工夫，寻找内心的平衡。到了山崎暗斋这里，朱子学变得越来越保守。

山崎的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年）著有《敬义内外考》 反对老师的“敬内义外”之说。他认为山崎的“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的观点“以身为内 以国家天下为外”是错误的 按照程朱的观点，内应当是指心，外应当是指身。他与他的老师同样非常尊崇朱子学。他认为，僧侣的最终目标是成佛，圣学之徒的目标是成为圣人。那么，具体说来应该如何做呢？在理论上应当尽量用平易的

语言、有趣的语言来解释朱子学，用朱子学普及平民教育；在实践上应该身体力行 以身作则 努力实践朱子学的思想。尊孔孟、宗程朱、弘扬圣学 宣传道统 以李退溪为榜样 继退溪之后 师承程朱之道 雄心、抱负可谓大矣。

后来以大家退野为代表的熊本实学派，更是在实践的层次上接受和实行了李退溪的思想，不同的是，这一派主要是在教育上努力，特别是大家门下出现的横井小楠、元田永孚，他们思想上受李退溪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明治时代教育方针的制定。

概括说来，日本朱子学派主要继承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的实践主义特点，在实践的层次上把朱子学的思想贯彻到底，并深入到庶民教育的层次，为在江户时代普及文化教育，迎接近代社会的到来、社会的发展演变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这种努力不仅在江户时代就具有明显的成效，而且在明治维新时代也能看到它的功绩。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就是在上述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江户时代，也为日本社会步入近代创造了物质和精神条件，奠定了基础。我们应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范围内去理解、把握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儒学

儒学 或称儒教 即指有关儒家的学问 儒家的思想。作为东方文化传统及人文精神之主流，儒学在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儒学的评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因为孔子“ 不语怪、力、乱、神 ”^① 孔子认为“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未知生 焉知死 ? ”^②。因此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 不讲神 不知死 怎么能说儒学是宗教呢 即使在魏晋时代 儒、释、道三教并立 这里的儒教就是儒学 也不是作为宗教的儒教。强调儒教之教，是指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也有个别的学者 把儒教看作宗教 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中国的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先生。他认为，“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本身就具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 ”又说：“ 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

书目 4 第 98 页、131 页。
书目 4: 第 98 页、131 页。

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运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

我认为，任继愈先生的观点是过于片面的。他只注意到了儒学与封建专制相结合，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一面，没有看到儒学的人文色彩、人道精神；他只看到儒学的政治化一面，而没有看到儒学的世俗化、人伦实用化的根本特点。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加地伸行博士，是当代日本新崛起的一位思想史家。他也认为儒教是宗教。在他所著的《儒教是什么》一书中，专有一章论述儒教的宗教性。在此书出版之前，他曾写过论文《儒教是什么？——儒教文化圈的历史和社会》^②，集中概括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认为儒教是以“孝为基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对东北亚人来说，所谓宗教，就是死及死后的说明”^③，而东北亚人因为是多神教，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是敬畏的，而对信仰以外的神是不惧怕的”。

加地博士的观点，强调了儒教文化中的祖先崇拜这一方面，主观性、随意性较强，缺乏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因而也失之于片面。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儒学、儒教或儒家思想呢？如何把握儒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呢？要了解和把握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儒学，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古代的儒学史，因为，儒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日本东京。

③ 见拙译：《儒教是什么》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第139期。

想，是中华封建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表现。

在先秦时代，儒家思想不过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地位并不显赫，也不是显学。从先秦至汉初，被列为“九流十家”之首，逐步成为显学，儒家也成为百家之首。班固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①这样，儒家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发其端，七十弟子及其后不继其业，涵濡融会，构成儒家思想，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这里还必须弄清楚的是，何谓“儒”？“儒”之意义是什么？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儒者，柔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认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其与人交接，常能优柔，故以儒表名”。^②而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③在《论语·雍也第六》中，中心内容就是阐明儒者修道的途径和方法，孔子主张要想成为一个儒者，首先必须划清“君子儒”和“小人儒”的界线，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其次，要想成为一个儒者，必须从德行和学问两个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陶冶思想情操，培养一个高尚的道德精神境界；另一方面，还要积累知识，增长才干，造就出经邦济世的本领，修德行必须做学问，做学问在于修德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分开的。从孔子、儒者及其对学问的看法可知他们并不是宗教布教者和神秘主义宣传者，而是探求经世致用学问的学者，要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正是从先秦时代以来儒学的魅力所在。

书 目 2 第 1728 页。

书 目 6 第 27 页。

书 目 4 第 88 页。